

被建构的“自由行”： 新闻话语的宏观语义、符号方式与权力关系

陈薇

摘要

大众传媒的话语分析是在具体的社会认知和文化语境下，对新闻生产、组织和诠释过程的整体考量。本研究在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下，以香港报纸有关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媒体建构议题的宏观语义、新闻格局、修辞策略与权力关系。研究发现，报道通过核心框架与延伸框架的转化与发展，显性框架与隐形框架的话语置换，来实现话语的争辩与平衡，丰富文本的内涵与象征；通过标题的宏观规则、预设情节的二元对立与“符号精英”的言语反应，来实现对宏观结构分层语义的分类与编排；通过客观性修辞实践和隐喻的符号表征，来实现对新闻事实的探索和权力关系的选择性建构，从而完成对这一宏大议题的筛选、重组和再现。

关键词

“自由行”、香港、话语分析、宏观语义、修辞策略

作者简介

陈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后，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电邮：carolchenwei@126.com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香港媒体对‘自由行’议题的话语构建与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5CXW028）阶段性研究成果。

The Constructed Issue of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Semantic Macrostructures, Symbolic Devices and Power Relations of News Discourse

CHEN Wei

Abstract

Media discourse analysis is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n the process of news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emantic macrostructures, news schemata and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media construction on

this specific issue, a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report of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by three Hong Kong newspapers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frames, the debate and balance of discourse was achiev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re frames and extended frames; the text connotation and symbol was enriched by discourse replacement of dominant frames and invisible frames. In the categorical classification and order arrangement of news schemata, a series of discourse strategies were used, such as the macrorules of news title, plot presupposition and verbal reaction. In the use of rhetorical strategies, the rhetoric of objectivity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metaphor were utilized, so as to complete the multiple narrative on this issue under the control of power.

Keywords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Hong Kong, discourse analysis, semantic macrostructures, rhetoric strategy

Authors

Chen Wei is a post-doct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ecture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bei University. Email: carolchenwei@126.com.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Youth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Issue on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by Hong Kong Media and National Identity” (Project Number: 15CXW028).

DOI:10.13495/j.cnki.cjic.2016.07.003

一、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从社会建构论和文化研究出发,新闻并不只是简单地反映和传递社会事实,而是话语、框架和叙事的综合体,一种受到新闻组织的常规、新闻工作者意识形态的偏向以及权力结构影响的被建构的文化产品(李艳红,2003;盖伊·塔奇曼,2008:178-184)。这个过程是通过文本的符号方式和表意实践来完成,即通过象征、比喻、概念化的符号工具以及句法、情节、主题和修辞的结构性的表意形式来实现(Pan & Kosicki,1993)。在不断变化的真实环境中,新闻媒介所建构的世界观或社会现实,为受众认知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因此,通过分析新闻语篇的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可深入地探究新闻生产选择性地建构事实以及影响受众认知的过程。

自2003年7月中央政府为了刺激因金融风暴和非典而受重挫的香港经济,出台CEPA经贸协定¹并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的政策以来,有关“自由行”的讨论在香港媒体中一直未曾被忽略。从最初媒体齐声称赞“自由行”拉动经济、创造就

业的正面效应,到政策实施十余年来因资源争夺、物价抬高、水客泛滥而激化的两地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文化冲突、地区尊重乃至有关国家形象、国族认同的大讨论,“自由行”由最初的经济议题逐步发展成为融合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综合性议题。媒体报道有了不同的声音,议题组合有了更多的变化。因此,本研究从话语的宏观结构和组织系统出发,通过对香港报纸有关赴港“自由行”议题的报道进行分析,从而探讨新闻构建议题的表意实践和符号方式。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问题有如下三个层次:1.香港的报媒如何建立“自由行”主题结构的诠释规则?2.运用怎样的宏观策略来表达新闻格局的多层语义?3.运用怎样的修辞策略来实现文本意义的多重表达?这三个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分别考察新闻进行话语建构的不同层次与面向。

(二) 话语分析理论与新闻话语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作为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学术概念,将话语看作是社会行为,强调在具体语境的范围内思考话语的语法规则、构成机制以及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丁和根,2004)。现代话语分析理论源于结构语言学,尤其是结构语法、生成语法和功能语法,随后发展的结构诗学和现代修辞学理论促进了对叙事、争辩和文体结构的话语研究。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话语分析开始向多学科交叉领域拓展。新兴的社会语言学和微观社会学引入行为与交往的概念,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开始关注话语的政治、社会功能和语境,从而完成了从话语的微观结构分析到宏观结构语义和宏观言语行为分析的转变(冯·戴伊克,1993:1-4;托伊恩·A·梵·迪克,2003:26-32)。

新闻话语分析正是兴起于现代话语分析理论从狭隘的结构主义范式转向容纳广阔的多元学科进程中。在这个时期,批判学派与文化学派开始关注语言符号自身的结构性特点,语言符号作为一种“被建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场域进行互动,从而对现实世界产生真实的建构作用(structuring)(Bourdieu,1991:10-12)。随着这一理论范式的转变,新闻研究也开始由长久以来的“客观—偏见”二元范畴转向社会建构论(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依建构主义理论学者看来,新闻并非镜子式的再现或者简单的扭曲现实,而是一种与社会结构互动的意识形态力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新闻话语(news discourse)并非简单的再现与维系共识,而是生产和制造同意(Hall,1982:56-90)。荷兰著名学者梵·迪克是当代西方话语分析学的代表人物之一²,他的话语分析理论为研究新闻话语提供了重要的范式。在他看来,新闻话语分析不是纯语言学的分析方法,而是通

过对新闻话语的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s)和新闻整体组织(global organization)进行考察,从而理解话语的意义和建构事实的方式(冯·戴伊克,1993:94)。

梵·迪克的话语分析体系包括文本的结构分析、话语生产分析和话语理解分析。在文本结构分析体系中,他提出了语义宏观结构(semantic macrostructures)和新闻格局(news schemata)一系列概念,语义的宏观结构是新闻文本总体内容的表现,新闻格局则是新闻文本的总体形式结构,决定了话语的范畴、每一范畴对应于语篇的一系列特定命题以及各个序列的总体安排。同时,梵·迪克也认为话语和权力紧密相连,并通过阶级、群体和机构权力直接体现。因此,对新闻话语的研究就是探讨权力在社会环境中(context)如何通过“篇章和谈话得到施行、表达、描写、示意、掩盖和认可”(冯·戴伊克,1993:166)。梵·迪克有关新闻话语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可概括为“综合性话语分析”(丁和根,2004),即既从语义符号学的角度来探究新闻语篇的文本结构、语法规则、组织机制和修辞策略,也从文化符号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特定社会情境中的行为与交际、新闻生产的制约因素和新闻话语的意识形态(托伊恩·A·梵·迪克,2003:26-32;李幼蒸,1999:572-578),这种话语分析理论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话语分析的“综合性分析”理论框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香港报纸“自由行”议题的报道进行测量、描述和分析,希望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全面解构来了解新闻构建议题的符号方式、表意实践和权力关系。根据研究问题的三个层次,本研究从新闻话语的主题结构、分层语义和修辞策略三方面来展开。

1. 主题结构,即对新闻主题进行划分、组织和诠释的系统性架构,考察主题的结构特征和诠释规则,属于宏观语义的范畴。结合“自由行”这一宏观议题自身的特点,按照一般性框架(generic frame) (Semetko & Valkenburg,2000)范畴的经济效果、冲突框架、道德框架、责任归因四个方面进行类目构建,从而了解新闻主题的设置、选择、组合与转换的方式与规则。

2. 新闻格局,即新闻话题的宏观结构和分层语义。梵·迪克将新闻格局的分层语义系统分为标题、导语、主要事件、后果、背景、言语反应、预测和评价八个部分(冯·戴伊克,1993:68-83;托伊恩·A·梵·迪克,2003:50-60)。这里借鉴他的理论,从所选样本的标题、主要事件、行为主体与言语反应入手来分析和解构“自由

行”报道的新闻格局和分层语义，进而理解话语的意义和语篇策略。

3. 话语修辞：即语篇的修辞手法和为增加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合理性、精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从而了解报道的情感倾向、价值取向和修辞策略，理解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二）样本来源和抽样

本研究以香港报纸对“自由行”议题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在研究样本的选取上，不同的报刊会根据自身的报道方针、报社风格、报社组织和意识形态来组织报道和建构框架。根据新闻学者McIntyre(1995)的研究，香港报纸的政治取向通常是读者为报纸在市场上定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这个标准划分，香港市场存在着大众报、精英报和亲建制报三大类报纸(Lee & Chu,1998)。其中，精英报纸以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为目标读者，处理新闻手法认真，文字风格讲究，包括《明报》《信报》《星岛日报》《香港经济日报》及《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大众报纸以普通市民为目标读者，秉承鲜明的市场化新闻导向和传媒消费主义，以《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太阳报》为代表。基于此，本研究选取香港地区三家独立且发行量大的中文商业报纸《明报》《星岛日报》和《东方日报》作为样本来源。其次，在时间范围的选取上，这三家报纸在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间有关大陆游客赴港“自由行”的新闻报道均被列为来源参考。这是“自由行”政策施行以来的第一个十年，这一年随着开放非深户“一签多行”、限制“双非”(夫妻双方均非香港居民)孕妇赴港产子、发展新界东北地区等政策的实施，以及“蝗虫”论、双普选、奶粉限购、国民教育等议题的争议，“自由行”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媒体报道更为集中，话语方式更为多元，因此有助于获取更为丰富的话语框架和叙事策略。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特定的议题，因此，选择目的性样本进行内容分析是一个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案，以“自由行”、“个人游”、“内地游客”作为关键词，以新闻报道的则数作为分析单位，以间隔抽样法对所选样本的新闻、评论、社论、专题等标题和正文进行检索和筛选。经由操作后，实际取得三报在此期间有关“自由行”的有效报道共367则，其中《明报》125则，《星岛日报》126则，《东方日报》116则。

三、新闻主题的诠释规则：“自由行”报道的主题框架

语篇的宏观结构是篇章或者对话整体内容的表现形式，用来解释话题(topic)、

主题(theme)或者概要(gist)(冯·戴伊克,1993:68)。新闻框架作为语篇宏观结构的代表,通过选择、强调、抑制或解释的过程,为新闻事件建立一种情境和内容,进而形成“诠释的图示”(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Goffman,1974:21)。因此,作为一项有效的概念化工具,框架可被用来了解新闻的主题和内容的深层含义以及选择性建构事实的过程。

(一) 核心框架与延伸框架的话语平衡

在新闻事件中,有一些框架担当着核心框架作用(core frames),作为新闻故事的切入点,通过由上而下地主导和组织新闻主题来监控信息的认知和理解过程。但也有一些延伸框架(extended frames)作为核心的补充,随着事件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议题的重点,呈现出更为丰富和细节化的特征(Hsiang & McCombs,2004)。

表1显示的是三家报纸对“自由行”报道的主题框架。研究发现,在“自由行”报道所涉及的四类主题中,经济效果和责任归因作为报道的核心框架,率先将这两类议题建立成新闻故事的切入点,使用将近七成;而冲突框架和道德框架作为议题的延伸,赋予故事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和更广阔的话语空间。卡方统计显示,主题框架和报别呈显著性关联,《明报》较其他两报呈现出责任、经济与冲突框架并行的主导设置,《星岛日报》使用更多的经济效果和道德框架,《东方日报》则重点采用责任归因,较少选择冲突框架。这种差异与各报的市场定位与政治立场不无关联:《明报》作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精英大报,享有较高的清誉与公信力,讲求新闻的公正与客观,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星岛日报》由于其现任掌门人有着深厚的中方背景,处理中国新闻较为谨慎,避免过激的言论和对中央政府的批评,尤其体现在对冲突事件的报道较为委婉与平和;《东方日报》作为香港地区发行量最大的通俗类报纸,更为关注本土利益,将报刊作为“民粹”的阵地问责政府,以迎合本地市场及读者的需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对于宏观框架的取舍、组合与转化上,也体现在更为微观的句子生产和修辞表达上。

表1 三报“自由行”报道主题框架的交叉统计

		《明报》	《星岛日报》	《东方日报》	合计
经济效果	Count	35	48	30	113
	%within三家报纸	31%	42.5%	26.5%	100%
	%within主题框架	28%	38.1%	25.9%	30.8%
冲突框架	Count	34	18	17	69
	%within三家报纸	49.3%	26.1%	24.6%	100%
	%within主题框架	27.2%	14.3%	14.6%	18.8%

道德框架	Count	13	18	16	47
	%within三家报纸	27.7%	38.3%	34%	100%
	%within主题框架	10.4%	14.3%	13.8%	12.8%
责任归因	Count	43	42	53	138
	%within三家报纸	31.2%	30.4%	38.4%	100%
	%within主题框架	34.4%	33.3%	45.7%	37.6%
合计	Count	125	126	116	367
	%within三家报纸	34.1%	34.3%	31.6%	100%
	%within主题框架	100%	100%	100%	100%

$$\chi^2 = 14.370, df=6, p=0.026 <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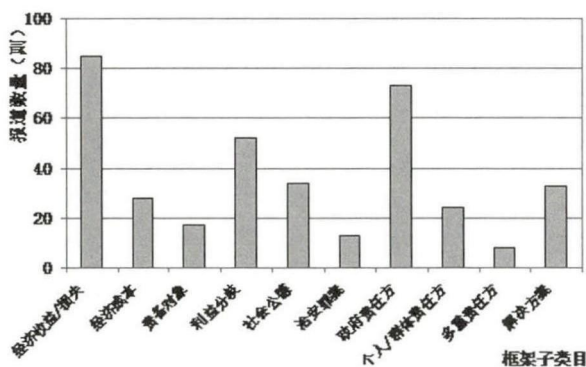


图1 “自由行”报道框架子类目分布图

为了深入了解每类主题框架下具体议题的分布，这里按照报道内容的特性在每个主题框架类目下分设若干子类目进行考察(见图1)。具体来看，有多达三成的报道采纳经济框架，强调“自由行”对香港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自由行”政策实施之初为香港经济带来了巨大收益，香港民众用“惠港政策”、“灵丹妙药”、“送大礼”来形容其对于经济和就业的提振效果。但政策实施十余年来，由旅游和零售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而投资和经营成本被推高，一边是大型商场“名店压境”、连锁金店药房急速扩张，一边却是小本经营的本土老店因为租金攀升、物价上涨而悄然搬离或结束营业。因此，在反思经济效果的主导框架下，有近九成的报道集中在经济的负面效应，并由大量的评论带来经济主题少有的情感卷入。责任归因作为自由行报道的第二类核心框架，用来明确事件的责任方、探寻根源或提出解决方案。香港媒体历来承担着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并在体制上扮演着“代议功能”(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 (Chan & So, 2003:249-276)，希望通过传媒的监察

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地干预。因此,在责任归因的子类目下,53%的报道集中敦促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市场失衡进行调节,“检讨”、“平衡”、“调整”成为问责政府最常用的词语,24%的报道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控制旅客流量、改善过境设施、增加旅游配套并出台政策打击黑工、水客、炒楼等行为。尤其在重大事件发生后,通过直接或间接引述政府官员和权威人士的官方话语作为评论,来表达具有倾向性的新闻立场和主观评价。

除了这两类主导框架以外,还有三成的新闻主题作为延伸框架,集中报道自由行议题与反议题的冲突和道德判断,赋予报道更多样化的情节设置。其中,冲突框架用来呈现较为两极化和戏剧性的主题,如发展相对于危机,和谐相对于矛盾,民主相对于专权等。当资本的浮躁轻而易举地凌驾于不那么具有生产力的市民空间,再加上两地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导致社会负面情绪聚集,“自由行”与“内地游客”则成了矛盾的宣泄口。在道德框架的子类目下,有超过七成的报道聚焦于内地游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如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颐指气使、随处饮食、插队“打尖”等,并表达了对于道德恶化的担忧。与前两类较为严肃和理性的核心框架相比,延伸框架呈现出更丰富的细节、更强烈的情感和更多样的语言风格,通过截取主要事件的某个剖面或选取相关事件对主要议题进行扩展,从而使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精英话语和草根话语,严肃话语与诙谐话语在框架的转换中达到平衡。

(二) 显性框架与隐形框架的话语置换

从社会建构主义出发,框架实质上也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用来考察认知内部呈现的结构性和受众理解新闻内容的方式。潘忠党(2006)认为,人们可能采取不同的框架或视角去组织事实,但“在任何一种行动的具体情境下,总有某一个框架将符合它的现象凸显在行动者的视野内,并限制可选择的行动类型”,即通过对“前台”信息的阅读和处理,来获取知识、形成态度并做出决策(Pan & Kosicki,1993)。因此,在框架建构的过程中,有可能同时出现位于前台的“显性框架”和潜藏在后台的“隐性框架”。这种“显”和“隐”的呈现并不是生硬且泾渭分明的,常常通过话语的隐喻和置换来实现彼此之间的转化与表达。

如《明报》在一篇题为“西贡露营客”的评论中讲述了西贡沙滩的见闻(明报,2012年10月9日)。作者不吝笔墨地细致描绘了沙滩风景美丽,游人如织,惊叹于沙滩的干净整洁和游人的环保意识。但笔锋一转回忆了在此之前所见以内地游客居多的贝澳营地的“惨不忍睹”,并且使用了让人玩味的隐喻修辞:贝澳“沦陷”、

“天堂与地狱，反差太大”。表面上看，这仅仅只是一篇游记，但在行文收尾处浅浅带过“普通话”，让本地读者读来心领神会。文章只字不谈道德标准，却巧妙地通过再现读者在记忆中积累的有关内地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报道，从而激活了“记忆情境模型”(model of the situation)(冯·戴伊克,1993:108-110)。模型提供具体细节，与包含意识形态和新闻价值观的社会共识信息共同形成有关事件的新模型，构建了“干净—脏乱”、“香港人—内地游客”两组截然不同的形象，潜在地将批评“自由行”游客不文明行为的“道德框架”隐藏在文本之中，进而强化了对内地游客的刻板印象。在文章结尾，作者更是用了“蚁多揍死象”的隐喻来表达对“客满为患”的不满，也巧妙地再次进行道德审判，使位于暗处的隐性框架走上“前台”。这种隐喻的表达在自由行报道中多次出现，看似插科打诨、不露锋芒，却比直接地抱怨与指责来得更为犀利与不留情面。

此外，也存在一种显性框架同时表达两种或以上隐性框架的情形。如《东方日报》在一系列整治“水客”(走私者)的社评中，主体上采用了道德框架，批评走私活动带来的罪案增加、道德恶化。但另一方面，在隐喻与细节中暗含了“责任归因框架”。香港作为自由港，并无立法取缔走私水货的贸易行为，之所以港人对于水客深恶痛绝乃至发起了“光复上水站”的抗议活动，实则因为他们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和社会秩序，但特区政府的应对措施却“乏善可陈”，因此对于“水客”的道德批判实则是对政府行为的问责。更深一层，报道也表达了对水货大行其道原因的质疑。“内地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中国制造’令人信心尽失”，最后归结为是“贪官和奸商才是令国人变成蝗虫，令香港永无宁日”(东方日报,2012年9月19日;2013年2月3日)，将对水货乱象的批评话语置换为对食品安全的质疑，将对“水客”的道德审判置换为对官员贪污腐败的批判。通过这种多重隐性框架的话语置换，在社会新闻的评论中巧妙地隐喻政治的象征意义，从而完成新闻话语的价值添加。

四、宏观结构的分层语义：“自由行”报道的新闻格局

新闻话语的宏观结构不仅有着自己的组织原则，还需要通过“某种整体的句法来限定主题在文本中插入或排列的可能形式”，从而对话语的范畴进行分类(categorize)和顺序编排(order)，这种界定话语形式的文本结构即为新闻格局(news schemata)。这里借助梵·迪克的理论，从标题、主要事件、行为主体和言语反应几方面来分析“自由行”报道格局的分层语义系统。

(一) 标题的宏观规则与斜曲标题

梵·迪克认为,标题是新闻文本的纲要性概述,记者将最重要和关键信息在标题中予以呈现并赋予语篇特定的话题。这个过程遵循着语篇的宏观规则(macrorules),即对语篇进行概括和归纳、删除来自事件不同方面不重要的细节并重新构建一个行动序列。具体表现在:1.使用主观性的字眼,如“北区议员批自由行滋扰”、“消费与掠夺”、“内地客药房血拼变血战”(明报,2012年8月27日,8月30日;东方日报,2013年6月26日),通过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动名词和形容词,表达具有倾向性的价值判断。2.使用人物的名字或者代号,如“田少玩‘劈腿’,九九见真章”、“中港矛盾发酵,罪在贪曾”(星岛日报,2012年8月30日;东方日报,2012年7月21日),通过表明权威身份,在较有争议的事件中暗示态度或责任归因。3.直接表达观点或立场,如“开门迎客是香港生存之道”、“两地矛盾勿激化,守望相助解困难”(星岛日报,2012年7月7日;2013年3月20日)。这些标题通过语篇的宏观策略,既概括和暗示了新闻主题,又向读者传递了隐藏在文本的总体倾向和新闻立场,从而具有重要的语篇机制。

另一方面,当这种抽象概括无法全面地总结整体语义时,就会产生因“斜曲标题”导致的新闻偏向。“斜曲标题”是指只构成语篇小部分信息的话题升级成为主要话题(冯·戴伊克,1993:105-108)。如《东方日报》一篇题为“双非孕妇冲急诊室回升”的简讯中,主体内容是介绍入境处采取行动打击“水客”,并且通过数据表明水客活动并未因为“一签多行”而恶化(东方日报,2013年3月18日)。但斜曲标题刻意突出内地孕妇被拒入境的人数和频次,并使用“冲”这一具有戏剧性并引人联想的动词,激活了历史上有关“闯关”事件的记忆情境模型和因为“双非”孕妇赴港产子导致本地孕妇“一床(位)难求”的负面情绪。这种斜曲标题虽然以真实性为基础,但通过有意识地删除、强调和再现“情景记忆”而重构了新闻故事,使得读者在理解新闻时出现偏差。

(二) 预设情节的二元对立与行动主体

福柯(1998:98)认为,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遵循话语形成的规则。话语分析所关注的是“陈述如何出现,为什么在这个位置的而不是其他陈述”。因此,话语一旦产生,就受到权力关系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话语本身也转化为一种权力。冲突性话语是权力控制的一种表现。以“光复上水站”事件为例,这是一场由香港地区部分网民发起,号召香港民众到港铁上水站抗议水客的活动。港媒的报道围绕着“港人利益”、“水客行为”、“港人反抗”和“责任归因”四个关键词展开,将行动群体分为内地水客、香港民众、香港警方和特区政府四类。这些群体作

为行动主体，在文本中通过特定的“语言标示符”来表达身份和形象，并通过大量的修饰语——名称、动词和形容词的选择来构建鲜明的二元对立。

表2 “光复上水站”报道的行动分析

行动构成	行动者身份	语言标示符(n≥3)
行动主体	示威组织者和参与者	抗议、推撞、狙击、怒斥、围堵、阻截、打击、忍无可忍
行动对象	水客(走私者)	横冲直撞、滋扰、贪婪、猖獗、泛滥、落荒而逃
行动协调者	香港警察	戒备、疏导、维持(秩序)、加强(执法)
责任归因者	特区政府	忽视、推卸(责任)、束手无策、难辞其咎

在这场抗议活动中，行动的主体——参与示威者被描述为一群为表达不满而“狙击水客”的行动者，所代表的香港普通民众被构建为受到滋扰的“受害者”形象，因物价推高、资源紧张而“忍无可忍”，所以为了捍卫权益而“被迫激进”。抗议的主要对象是往返于口岸的“水客”，他们被描述为“横冲直撞”、“贪婪猖獗”的“水货兵团”，在抗议活动中“落荒而逃”。行动的协调者——香港警方在这次行动中“维持秩序、疏导市民”，并“尊重以和平理性方式去表达意见的自由”。而行动的责任归因者——特区政府被塑造成“束手无策”、“紧急扑火”所以“失职”的责任主体，需要采取长期措施来妥善解决“水货乱象”。通过这种话语表述，在新闻语篇中建构起“内地水客”与“香港居民”，“大地产商”与“平民”，以及“中央利益”与“香港利益”的二元对立，通过进程描写、细节刻画和直接引用，强化了冲突双方的对立与紧张。

但同时，所选的报纸在报道手法上也注重讲究措辞的准确与观点的平衡，一方面突出声讨“水客”的走私行为，一方面也强调对政府施政行为的理性问责。尤其在“光复”活动后期，当个别偏激的示威者将行动的矛头由“水客”转向了对所有内地人的攻击，试图将示威行为发酵为充满歧视的扰民行为，所选的三家报纸通过评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其实是反对派妖魔化个人游、摧毁香港自由港核心价值的突出表现”(星岛日报,2012年10月16日)，“过于激烈的抗议行为，只会引发冲突，激化矛盾，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也不符合香港整体利益”(东方日报,2012年9月19日)，小心地避免将事件上升到两地对立的高度和对两地融合趋势的质疑。

(三) 言语反应与“符号精英”

言语反应(verbal reaction)是梵·迪克对事件后果格局的叙述中一个重要的常规策略，即在重大事件报道之后，通过直接或间接引用权威人士的官方话语或公开

评论,来表达记者的主观意图并扩展报道的多元立场。如在“光复上水站”抗议活动后,引用特区政府官员的话语安抚民众:“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中间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细节,政府会严厉采取有关执法行动’”(星岛日报,2012年9月19日)。在谈到面对游客的大批涌入如何发展香港旅游业时,引用新上任的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的发言作为评论,“本港已刻不容缓要做好自身承载力,‘平衡’发展是旅游业的重中之重,既要顾住香港人的优质城市生活不受影响,还要开拓新兴市场”(星岛日报,2013年4月7日)。这些拥有话语权的“符号精英”(symbolic elites)是大众知识、信念、态度、伦理、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依靠符号资本来操纵信息的数量和类型,影响话题的相关性和舆论的普遍性(冯·戴伊克,1993:171-176)。同时,社会等级在新闻可信度和可靠性的修辞中也被体现。

但事实上,在新闻生产的实践中对于这种“符号精英”的选取是主观的过程,并在新闻中通过表明事件参与人的名字和身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他们的话语进行暗示。符号精英们受到自身所在利益群体和其他相关群体的制约,无法完全自由地表达立场。因此,其言论作为维护本群体或阶级整体利益的权力工具,通过各种职业规范和价值观在意识形态上予以掩盖并渗透,从而在行为交往中产生偏见。例如,在评价“双非”孕妇赴港产子和奶粉“限购”等冲突性事件的报道中,表面上采用了平衡修辞,通过引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和普通民众的言语反应来表达多元的观点,但事件主要涉及对象的内地游客、内地团体和中央政府的话语,却很少或没有被纳入话语场域。因此,新闻机构通过新闻来源的偏向和特定主体的建构,将新闻立场隐匿在多元化的言语反应背后,巧妙地表达并强化了自身倾向,从而巩固现有的权力结构。

五、媒介话语的权力再现：“自由行”报道的语篇修辞

作为一种说服的艺术和象征环境的建构,修辞行为“是一种权利宣示与权力沟通,是识别对方话语力量从而改变权力关系的策略”(胡春阳,2005:46)。这种策略既与话语主体和受众的个性心理特征相关,也和传媒组织的社会意识形态相关。梵·迪克认为,新闻修辞通过运用如层级组织、新闻格局、分类、排序及相应的布局安排等提升新闻特征的各种相关性和显著性的方式来实现内容的强调和侧重,包括为增加报道的真实性、合理性、精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从而让受众注意、理解、记忆直至实现劝服。

（一）实现劝服的客观修辞

新闻客观性的实践由事实修辞(the rhetoric of facticity)、中立修辞(the rhetoric of neutrality)和平衡修辞(the rhetoric of balance)这三种修辞方式构成(Roeh & Cohen,1992)。为了强调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利用现场目击者的直接叙述和目击报道来描写事件的进程、引用表示人物、事件、时间等精确的数据。如《明报》在描写水客“走货”行为的报道中,采用目击者的直接叙述和细节性的描写来刻画水客的狼狽与贪婪:“从九龙塘到罗湖,短短的一列东铁线,纸皮箱与手拉车由沿线一个个车站挤到车厢,轮廓口音各异的背包客,紧拉着重中之重的奶粉或是稳中求要的尿片……各种花式的手拉车、行李箱、背包、纸皮箱,各据一方。”(明报,2013年2月3日)同时,引用大量的精确数据和目击报道全程记录“水客”的一天:“有水货客透露,自由行水货客每次走货可赚200至600元,价钱按货种而定,若一周五天、每日走4次货,每月可赚1.6万至4.8万元……。”(明报,2012年8月30日)通过这种客观修辞的运用,将贩货行为描述得惟妙惟肖,贪婪之相跃然纸上,读者赏来也津津有味。在这两个例子里,细节的描写和数据的引用不是为了突出精确,而是通过它所表现出的新闻真实,同时满足有效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基本认知和情感条件。

除了通过细节和引用来确保报道的真实性,客观修辞还体现在强调事情发生的具体时空,建立起新闻事实之间的联系。例如,为当前事件创设受众熟知的语境、描述后果和预测影响、尽可能使用常识性的概念和一般程式等。如《星岛日报》在评论新界东北发展规划时,将这一政策性提案进行了历史化的处理,将规划纳入自2003年自由行推行以后香港经济逐步复苏、民生逐步改善的大背景下,抨击了别有用心反对派“去中国化”的言论,肯定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加强陆港融合的必要。这种客观修辞的策略性手段运用,能够帮助读者结合自身的认知和“记忆情境模型”,诠释更为多元的文本意涵,从而通过对话式的文本,不断寻求和接近事实的真相。

（二）运用隐喻修辞来表达文本的主观意涵

隐喻作为人们对外部事物进行常识性认知的抽象,不仅是一种话语修辞,也是一种稳定的思维方式,通过在常识性领域组织认知来重构人们的直接经验,并构建以话语为中介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甘莅豪,2011;潘忠党,2006)。由于隐喻的抽象性和强大的说服力,常常在表意丰富却模糊的政治话语中被使用,并通过政治修辞来简化信息、解释概念、传达观点(Edelman,1971:65)。一个完整的隐喻修辞包含源域(source domain)与目标域(target domain),每一个隐喻都是源域指向目标域映射与

对应的结果(Lakoff,1993:202-251),通过源域的字面解释与目标域隐喻解释之间的张力来建构意义。如在《星岛日报》一篇叙述社会各界对放宽深港“一签多行”政策反应的报道中,特写新界北区居民在抗议游行现场打破“沙煲”的场景,其中源域“沙煲”就是其狭小而沸腾的特征向目标域“港人压力”映射的结果,其所指的意涵为本港居民的压力“爆煲”、“迫爆”,从而强化了矛盾双方的冲突与紧张。

从修辞的角度来看,隐喻的使用是一种言语行为,它不是语义系统的正常产物而是使用者的主观选择,因此会产生话语偏见。同时,隐喻也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语篇修辞对行为常识化(naturalize)的过程中,通过有意识地遮蔽、强调和重新组合进行传递,巧妙地将意识形态植入话语并表达权力关系(Koller,2004:15-26)。甘莅豪(2011)指出,隐喻作为修辞工具,承担着“描述性隐喻”的客观描述功能和“评价性隐喻”的解释功能,背后体现出意识形态和传播者的“修辞意图”。例如,在描述自由行的经济效果时,采用“潘多拉盒子”、“双刃剑”、“Happy Problem”等源域能指,表达了立场各异的目标域倾向。再如,对内地游客的刻画就使用了一系列的描述性隐喻:“蝗虫”³、“强国人”、“自由人”。用源域“蝗虫”的浩浩荡荡、贪婪蚕食农作物的特征映射“双非儿童”这一目标域,如此明显的负面意涵表达了极度厌恶与轻视的情绪。与之相似的描述性隐喻还体现在对内地游客的刻画上:“一家大细,以强国之名,如入无人之境,气场极劲,最好躲避”,用“强国人”、“自由人”的源域来指向荷包坚实的内地游客,更因此映射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群体,表达更加隐晦但言辞更为犀利,调侃背后的身份疏离不言而喻。这一系列围绕着内地游客所形成的“修辞意图”彼此联系,互为补充,互相映射,并非是对事件公正和客观的再现,全然忽视了自由行为香港所带来提振经济、扩大就业的正面效应,而是借助隐喻表达了媒体偏见的论调。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香港报纸有关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议题的报道进行话语分析,从新闻话语的叙事结构、宏观语义和修辞策略等角度,来深入了解新闻构建议题的话语策略。遵循着对话语宏观结构进行解构的思路,研究发现,报道通过采纳经济效果、责任归因的核心框架以及冲突设置、道德判断的延伸框架,来实现“自由行”多重话语的争辩与平衡;通过显性框架与隐性框架的话语置换,使得在“后台”的隐性叙事走入“前台”。同时,报道通过标题的宏观规则来暗示主题并表达立场;通过设置冲突性的行为主体、使用大量的“语言标示符”以及采用“符号精

英”的官方话语，在组织行动、主要事件和情境的具体语义中实现话语的劝服并完成新闻话语的价值添加；通过采纳客观性修辞和符号隐喻来完成对事实的探索并诠释丰富的文本意涵。

在这种宏观结构的背后，是权力关系这只看不见的主线在拉扯，围绕着新闻构建议题的文本框架、符号方式和表意实践的“话语包”(discursive package)，不同权力关系在话语的领域进行争辩、交锋、宣传、说服或结盟(Gamson,1988)。香港的权力中心几经更迭，而处于社会大系统中的香港传媒，在政治、经济、市场与文化力量的多重博弈中，运用多种新闻范式和话语策略来应对“权力场”的转换并与社会系统内的权力中心进行互动(陈薇,2014)。作为一个全面渗透香港社会的政策，“自由行”在其推行的十年间，一方面以每年两千亿港元的直接利益支撑起香港旅游、酒店、零售、餐饮、运输等行业及创造就业，一方面也因为大量旅客的涌入和资源的争夺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十年，香港经历了中国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本港转口贸易中心的优势尽退，香港人也从大陆“表哥”客如云来、一掷千金的喧嚣中细品着心理落差的五味杂陈，“自由行”既是这十年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矛盾转移和迁怒的对象。对于市场化导向的香港传媒而言，读者的需求和本地市场的反应是报社进行商业考量的根本，而传媒组织“非组织集中化”(Fung,2007)的政治背景和由此而生的利益牵扯，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传媒组织和新闻生产的面貌。换句话说，权力控制着话语的物质生产、表述和传达，而权力机构和权力群体的话语是影响社会共同认知的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各自的话语策略和文本生产，联合起来影响着信息的传播，传递主导目标和价值观，从而完成对“自由行”这一宏大议题的筛选、概括、重组和再现。

(责任编辑：潘亚楠)

注释 [Notes]

1. CEPA中文全名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全名为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是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于2003年6月29日正式签署，主要内容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方面。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test/2005-06/24/content_9318.htm。
2. 在本研究所列的两本参考文献《话语、心理、社会》和《作为话语的新闻》中，译者对原作者Van Dijk的翻译分别为“冯·戴伊克”和“梵·迪克”，为了统一全文的人名称谓，在本文中统一用“梵·迪克”代表。
3. “蝗虫论”来源于2000年初，大批双非孕妇以游客的身份来港产子，使得本地原本就不宽裕医疗资源更为紧张，之后随着“双非儿童”和内地优秀学生来港求学日益增多，分摊了

本地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蝗虫论”在一次次冲突中被重新释义。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陈薇(2014).媒体话语的权力场:香港报纸对中国大陆形象的建构与话语策略.《国际新闻界》,36(7),20-37.
- [Chen, Wei(2014).Media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power: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strategy on the image of mainland China in Hong Kong newspapers.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36(7),20-37.]
- 丁和根(2004).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11(1),37-42.
- [Ding, Hegen (2004).The theory, content and methods of discourse analysis about mass medi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11(1),37-42.]
- 冯·戴伊克(1993).《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译).北京:中华书局.
- [Van Dijk (1993). *Discourse, Psychology and Society (Tra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盖伊·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8年).
- [Tuchman, G. (2008). *Making News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8).]
- 甘莅豪(2011).媒介话语分析的认知途径:中美报道南海问题的隐喻建构.《国际新闻界》,33(8),83-90.
- [Gan, Lihao(2011).The cognitive approach of media discourse analysis: the metaphor construction of China media and U.S. media in South China Sea.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33(8),83-90.]
- 胡春阳(2005).《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上海.
- [Hu, Chunyang (2005).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 李艳红(2003).政治新闻的模糊表述:从中国大陆两家报纸对克林顿访华的报道看市场化的影响.《新闻学研究》(台湾),169-199.
- [Li, Yanhong (2003).The ambiguous representation in political news: Analysis on the marketing effect from two mainland newspapers' coverage of President Clinton' visit to China.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pei)*,169-199.]
- 李幼蒸(1999).《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Li, Youzheng (1999).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semiotic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 米歇尔·福柯(1998).《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上海:三联书店(原著出版于1972年)..
- [Foucault, M.(1998).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2).]
- 潘忠党(2006).架构分析:一个理论亟需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1),17-46.

- [Pan, Zhongdang(2006).Framing analysis: toward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 Society (Hong Kong)*,(1),17-46.]
- 托伊恩·A·梵·迪克(2003).《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8年).
- [Teun A. Van Dijk (2003). *News as discourse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8).]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han, J. M. & So, C. Y. K. (2003).The 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 of media: Citizens' and journalists' evaluations of media performance. In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Edelman, M. (1971).*Politics symbolic ac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Fung, A. (2007).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2), 159-171.
- Gamson, W. A. (1988).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11), 161-174.
- Goffman, E. (1974).*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 Hall, S. (1982).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T. M. Gurevitch,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and NY: Methuen.
- Hsiang, I. C. & M, McCombs (2004). Media salience and the process of framing: Coverage of the Columbine school shooting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 22-34.
- Koller, V. (2004).*Metaphor and gender in business media discourse: A critical cognitive stud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akoff, G. (1993).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 Ortony,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Intyre, B. T. (1995).Public perceptions of newspapers' political positions: A perceptual map of Hong Kong newspaper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1), 126-135.
- Lee, S. N. P. & Chu, L.L. (1998).Inherent dependence on power: The Hong Kong press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 (1), 59-77.
- Pan, Z. D. & Kosicki, M. G. (1993).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1), 55-75.
- Roeh, I. & Cohen, A. A. (1992).One of the bloodiest day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pen and close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 (2), 42-55.
- Semetko, H. A. & Valkenburg, P. M. (2000).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 93-109.